

往事如昨

一场终生难忘的考试

杨淳

1983年5月2日上午,上完两节课后,我回到办公室,捧起《中国青年报》和《烟台日报》浏览起来。不经意间,在《烟台日报》的一个角落看到一则“招生启事”,大意是,为适应教育形势发展的需要,经山东省政府和教育厅批准,“烟台教师进修学院”更名为“烟台教育学院”,自当年起开始招收全日制大专学生,国家承认学历。招生范围和对象为当年烟台地区下辖的16个县市的中学教师,公办和民办教师均可报考。报考年龄放宽到35岁,婚否不限。

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完全中学,初中、高中共30多个班级。在100多名教职员中,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,高中部约有1/3,初中部仅有不足1/3的中师生,民办教师是主力军。我就是初中部民办教师中的一员。

我们学校的情况是这样,全县兄弟学校的情况也基本相同,整个烟台地区乃至全省的情况也都差不多。可见,教育要振兴,尽快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学历水平是多么迫在眉睫的事情!

5月中旬,招生简章下发到了各个学校。因为第一年招生,受方方面面的条件制约,1983年只有中文系和物理系各招生一个班,每班38人。考试时间定在7月16日。

我怦然心动。我是初中语文教师,尽管是民办的,也在招生范围之内;尽管年龄偏大(33岁),但也符合招生要求。如果报考,现实困难摆在面前:一是考试时间近在眼前,满打满算只有一个多月,这期间两个班级的教学任务要完成,每天要备课、上课,100多名学生的作业、作文要批改,想要按部就班地复习是不可能的,想复习只能在课余和晚上进行;二是1983年农村已把口粮田、责任田(交公粮的)分配到户了。6月中旬正是夏收季节,家中有两亩多麦子要收割,还要抢种秋玉米,这两样活起码要花十多天的时间,也就是说,课余复习的时间不足一个月了;三是我已到中年,家庭、生活压力蛮大,与20岁出头、时间充裕、精力充沛的小青年同台竞技,挺悬的。当年刚读到初三就赶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,高中根本就沒上过,我是“初中生教初中”,要和中专、高中毕业的小青年较量,更悬;四是家中还有五亩多地,父亲被哥哥接到北京了,两个孩子尚年幼,在小学读书,如果我考上了,沉重的家庭担子就要全部压到妻子一

个人身上。

我踌躇再三,回到家还是把报考的想法和妻子说了。妻子回答得很干脆:“只要你能考上,家里的活我全能干!”妻子的大力支持,增添了我报考的勇气和信心。

6月上旬,我约上几个要好的同事一起去县招生办报了名,然后到县医院做了体检。根据招生办反馈回来的信息,全地区报考中文系的有2000多人。由于报考的人数太多,一些报考人数多的县做了预选,最后领到准考证的有600多人。这期间,有两位同事因为现实困难和种种原因而放弃。我暗下决心,当年是没有机会进考场,这次党和国家给了机会就不能放弃。“世事我曾抗争,成败不必在我!”郑振铎的话在我耳边回响。

时间很快来到7月16日,福山的考点设在距离我家约20公里的福山师范。

第一场考语文。我所在的考场有两名监考老师,一名是教育学院外语系的张主任,一名是福山师范教务处的王绍先主任。

在这之前的一个周是全国普通高考,我所在的中学是考点之一。那时考试规则不像现在这样,开考30分钟之后,多余的试卷就会传出考场。近水楼台先得月,语文开考半小时后,我就得到了一份试卷,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做了起来。1983年的全国高考语文试卷是试题改革的第一年,除了传统题型之外,还增加了选择题、阅读分析题,加大了阅读量,作文由传统的一篇,变成一大(议论文)一小(说明文)两篇。我用了30多分钟将前面所有的题目都做了出来,和毕业班的语文老师对了一下答案,基本正确。如果再写后面的两篇作文,时间也绰绰有余,这无形中增强了我的信心。

等真正考试时,当试卷发到手之后,我却紧张起来,题量出乎意料非常大,十几页八开纸上的试题密密麻麻。考试前曾给自己定下的、平时考试时也经常叮嘱学生遵循的原则:试卷到手先总览试题,做题时先易后难,先做有把握的、得分点的试题;早点把作文写完,时间充裕再啃难题。这个耳熟能详的原则,此时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。我连作文题是什么都没顾得看,闷着头,从第一题开始排着做了起来。

时间悄悄地从笔尖滑过。作文题前一个大题是文言文阅读分析,其中有一大段将近

200字,要求译成现代汉语。文言文译成现代汉语,字数起码是原文的3到4倍。我紧赶慢赶,当还有两三句没译完的时候,电铃突然炸响,监考老师提醒,考试时间还剩最后30分钟!王绍先老师补充提醒:“后面还有两篇作文,有的考生还没动笔写!”

犹如一声惊雷,我有点蒙了。顿时心跳加速,额头冒汗,身上痉挛,有一种想小便的感觉。好在理智最终占了上风,我很快镇定下来,迅速完成了那两三句的译文。时间又溜走了约五分钟。

作文题目赫然在目,是两篇命题作文。一篇记叙文《发生在师生间的一件小事》,要求400字左右;一篇议论文《浅议师德》,要求是根据前面一文记叙的内容有感而发,800字左右。

容不得我仔细构思,用奋笔疾书来形容毫不为过。记叙文完成,300字多一点(作文字格有标示)。

当考试结束的钟声响起时,议论文也写到最后一句,随着钟声结束,我也给文章画上了句号,620多字。

25分钟两篇文章,900多字!尽管字数离卷面要求还有一点距离,但两篇文章均结构完整,主题明确。

后来我曾特地做过试验,拿起一张报纸,选定一篇文章一边看一边抄写,25分钟只能抄写600多字,我连着试验了两次都是这个结果。连我自己都怀疑当时在考场上是怎么做到的。

接下来的几科考试,试卷的题量和难度适中,相对顺利。我以还算不错的成绩进入烟台教育学院中文班,我是38人里5位民办教师中的一员。其余的大多数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中师毕业生,而且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。

从老师口中,我们得知600多名考生中大部分人的语文试卷没答完,并了解了当初命题的初衷与过程。原来,学院领导考虑到报考人数众多,录取人数相对较少,语文学科又是中文系的重中之重,试题一定要有较大的区分度,因而邀请了烟台师专(现鲁东大学)中文系的老师和烟台教育学院中文系的老师共同命题。命题宗旨是:依照当年普通高考题型,题量和难度加倍。这也是我们的考试定在普通高考一周后的原因。

那场考试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,但至今仍刻骨铭心,终生难忘。

乡村记忆

贴晌饭

孙瑞

“贴晌饭”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在农村田间地头的一道风景,是生产队为收割小麦的社员安排的一顿加餐,又称“第四餐”或“百家饭”,类似如今的“下午茶”。吃“贴晌饭”场面生动,妙趣横生,令人回味无穷。

“九成收,十成掉”。过去,夏至一到,正是农村麦收开镰之时。为了把熟到八九成的小麦迅速地抢收回家,生产队长在会上再三强调:“三夏”稍纵即逝,麦收丝毫不能懈怠。大家今天磨好刀,明天开镰!

随着队长的一声令下,打响了麦收战役“第一枪”。

天刚放亮,社员们各自带好镰刀、磨刀石、水壶等,从山地到洼地逐一排开,开镰收割小麦。趁太阳还没露头,抢时间,赶速度。从早晨四五点钟开镰,六七点钟吃早饭,然后干到上午十一点钟再收工午休。下午一点钟继续,直到三四点钟,人已经累得东倒西歪,人仰马翻,再也没有一点力气了。这个时候,男女社员们抬起头齐刷刷地望着村口,盼望送“贴晌饭”的人冒个头、露个影。

忽然间,在远处的乡间小路上,一位年长者步履蹒跚地推着独轮车,朝着麦田走来。“贴晌饭”来了!

“吃饭喽……”生产队长喊了停工的命令。送饭的小推车摇摇晃晃刚到地头,还没有停稳,人们就呼啦啦地围了上来。

三四十种不同风味的饭食混合在一起,碰撞出几十种诱人的香味儿。饥肠辘辘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寻找着自己的饭食。

“二爷爷,这竹篓是俺的。”“二叔,把红包袱给我……”“大家都别急,仔细点拿,别把汤洒了……”

人困马乏的社员们纷纷丢下镰刀,一屁股坐在麦捆上,用毛巾擦着汗,有的在大褂巾上蹭去汗珠,开吃。

一位刚结婚不久的小媳妇,长得眉清目秀,不慌不忙地打开绿色军用水壶,含了一口水喷在手上,搓了两下,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小手帕擦了擦,文绉绉地吃起“贴晌饭”。几个刚毕业的小青年几乎看傻了眼。

那时候,不是人们不讲卫生,而是根本就没有地方洗手,即便有小河沟,也要跑出

去老远,割麦子已经累得精疲力尽,人们干脆往衣服上蹭蹭得了。

我母亲给我送的是猪肉炖宽粉条子。我很高兴,故意地发出“哧溜哧溜”吸粉条的声音。旁边的三哥喜欢大葱蘸酱,他咬一口大葱,再蘸一口酱,惬意地大嚼起来。还有的人把绿皮咸鸭蛋的顶部敲开一个口,用筷子往外夹,鸭蛋黄流着油,也挺馋人。不知谁家送的是虾酱香椿炒鸡蛋,老远都能闻到诱人的香味……

我和几个刚刚下学的年轻人聚在一起,大家一边吃一边互相打打闹闹。有的学鸟叫,有的吹“阿飞哨”,还有的偷偷往女孩子的头上放麦穗。

吃完饭,一位漂亮的姑娘凑到那位刚刚复员回家的退伍兵面前。“我的镰刀不快了。”姑娘一边说着,一边偷偷地塞给他一根嫩绿的黄瓜和一个鹅蛋。

兵哥哥受宠若惊,哪里还有心思磨镰刀,一不小心,手上划出了一个大口子。姑娘看见了,心疼地拽着他的手,用撕开的手绢包扎伤口。这大概就是上世纪70年代乡村爱情最原始、最质朴的一个场景了。

“贴晌饭”由来已久。白居易任关中盩厔(今陕西周至)县尉时,在《观刈麦》一诗中,记载了麦收时节“贴晌饭”的情景:“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妇姑荷箬食,童稚携壶浆,相携饷田去,丁壮在南冈。”女人挑着盛饭食的竹篮,小孩子提着装着汤水的陶壶,给收麦人送“贴晌饭”。

打头的开镰了,大家一字型排开,又生龙活虎地割起麦子。身后的麦子一捆捆立在那里,一片金黄,一派丰收的景象。

“贴晌饭”后,又割了半小时,我的右手掌开始剧烈疼痛起来,腰累得又酸又疼。伸开右手一看,手掌上磨起了两个黄豆大小的血泡。但是直起腰来抬头看看,麦垄依然望不到头……

晚上收工回到家,母亲把缝纫针先在煤油灯头烧一烧,然后把血泡挑破,血水淌了出来,疼得我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儿。

如今,农村早已全部实现了机械化,农民再也不用为麦收发愁了。当年的“贴晌饭”自然就消失了。